

“钱存训先生纪念展”媒体见面会发言选登

国家图书馆善本组 整理

2015年4月22日，国家图书馆在北区稽古厅举办“钱存训先生纪念展”媒体见面会。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先生主持见面会，邀请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郑炯文先生、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周原先生、国家图书馆展览部主任林世田先生、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馆员刘波参加，向媒体记者们介绍钱先生的生平、事业与学术成就。我们在此选登此次媒体见面会的部分发言，藉以表达对钱存训先生的景仰和怀念。

周原（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

首先我非常感谢国家图书馆举办钱存训先生生平和学术成就的展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钱老4月9日过世，国家图书馆得到这个消息，大概是在10号、11号这样一个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准备这样一个内容很丰富的展览，展示钱老一生的生平，还有他学术上的贡献，以及他和国家图书馆的渊源、关系等，真的是很不容易，做得很好。我觉得这个展览讲得挺丰富的，我就简单地再补充一点儿，或者是把其中的一些重点再谈一下。

首先，钱存训先生和芝加哥大学的关系应该说时间是比较久远的。他是1947年到的芝加哥，一直到他过世，也就是今年2015年，一直都生活在芝加哥。这对在北美生活的人来说，不管是华人移民还是美国人，都是不多见的。在北美一般流动性比较大，一生当中都会换几个地方，这样的比较多。像钱先生这样，到了芝加哥就一直待在芝加哥，直到他过世，这样的是不多见的。

47年他来的时候，当时是中华民国的教育部委派钱先生到美国华盛顿，想让他把当年他在抗战时候负责转运到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一部分当年北平图书馆的善本书和重要的舆图押运回国。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段历史，他去了以后，国内的内战就打得比较紧了。当时国民政府的想法是，等战争稍微停一停，然后再往回运。可是战争就没有再停下来。最后，我们大家也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了。

在这期间，当押运工作不能够按计划进行的时候，我们芝加哥大学有一个叫 Herrlee G. Creel 的教授，他的中文名字叫顾立雅，是当时远东语言文明系的系主任，也是我们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项目的创始人，他就邀请钱先生到芝加哥大学去帮忙，开始是对我们的一些中文收藏进行编目。因为那个时候，远东图书馆就是由顾立雅先生自己负责的，大概有将近十万册书了，可是一直没有编目，学生就在书架上取用。我们藏书的人有概念，十万册不算太少了，找起来不那么方便，所以就急需有人编目。

顾先生原来在北京留学的时候，和原来北平图书馆的副馆长，后来是馆长的袁同礼先生熟识。顾先生听说北平图书馆有一位先生正在美国，他就和袁同礼先生联系，请钱先生到我们那边去帮助编目。编了两年以后，又申请让他延期留下来，留在我们芝加哥大学，成了我们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的第一任馆长。以前虽然是顾立雅先生兼任，但是并没有说他是馆长，所以我们说钱先生是第一任馆长，这是在 49 年的时候。

说起这个故事来，还有一段曲折。当年美国有一个排华的法案，华人想留在美国是很不容易的，想拿到绿卡是不可以的。后来还是由芝大出面，伊利诺伊州的议员专门做了个提案，才把钱先生留下来，在美国获得了永久的居留权。钱先生一留就是几十年，他的建树很多，展览展示了一些。我想哈佛燕京的郑炯文馆长能讲得更多一些，因为郑馆长也是我的前任，也曾经在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做过馆长，并且是钱存训先生的学生。

再有，钱存训先生不仅是东亚图书馆馆长，是个图书馆员，同时他也是一个学者。他在 57 年的时候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博士。他同时在两个系里有教职，一个就是当时的远东语言文明系，现在叫东亚语言文明系，开始是副教授，后来是教授。他还在我们芝加哥大学的 Graduate Library School，应该叫做图书馆研究生院任教。我们学图书馆学的都知道，美国现在图书馆学教育只有研究生教育，没有本科生。但在 30 年代、40 年代的时候，以及再往前，美国的图书馆学教育也是本科生教育。芝加哥大学的图书馆学院是美国第一所把图书馆学教育变成研究生教育的学院，是把图书馆学教育作为研究生教育的创立者，所以一直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图书馆学学院。钱存训先生也是图书馆学研究生院的一位教授。

直到今天,在美国的图书馆学教育里,基本没有关于东亚图书馆的专门课程,也没有关于东亚图书馆的专长,算不上专业,类似于一个分支的这样一种教育是没有的。可是当年钱先生在的时候,由于他这样一种特殊的身份和学识,就开了这方面的课程,东亚图书馆方面的训练就变成了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的特点之一。其他的学校是开不出这样的课的,也培养不出这样的专门人才。后来他还在芝加哥大学操办过全国性的暑期学习班,关于东亚图书馆员的培训班。

说起来挺有意思的,当时那个学习班培养了一批人,其中有一个人,我们可能都是耳熟能详的,就是后来做到台湾省省长的宋楚瑜先生,当时是那个学习班的一个学员。他本来是想要当图书馆员的,据说当时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回了台湾,结果后来成了台湾省的省长,也竞选了总统,最后没有成功,现在是亲民党的主席,大家都比较熟悉。

郑炯文（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

我是钱先生的学生,但是我不是他的高徒,我可以说是他最没用的一个学生。我也在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工作过,但我离开芝加哥大学快三十年了。刚才周馆长详细地介绍了钱先生和芝加哥的渊源、跟东亚馆的关系,我只是想讲几点,关于钱先生的为人,跟他怎么做学术研究。

我记得四年或者五年前,在南京大学钱存训图书馆成立的会议上,我用“不卑不亢”这四个字来形容钱先生的为人。“不卑”是什么意思呢?图书馆员一般来说在社会上地位不是很高的,但是钱先生并不因为自己是一个图书馆员就感到自卑,他对图书馆学有一定的热爱。“不亢”是什么意思呢?钱先生在东亚图书馆界有一定的地位,他退休以后这几十年,一直在做研究,有一定的名气,但是他这个人并不高傲,认为我是学者就看不起其他人。这从很小的事情可以表现出来。我跟他在图书馆工作的时候,就看得到的。美国那时候有八十多个东亚图书馆,不管你是从哪个东亚图书馆来拜访钱先生的,他都一定请你到中国城去吃一顿饭,你是很大的学校的他请你吃饭,你是很小的图书馆的同行也请你吃一顿饭。他的为人,没有说我现在很有名气了,你是小地方的馆员就看不起。这个呢我倒是学坏了,现在这几十年在东亚馆,哈佛图书馆就批评我为什么整天请客,我就说人家八千多里路来拜访你,不吃一顿饭那不好意思吧。这个还是从钱先生那里学来

的。所以我认为，他这个人是不卑不亢，从很小的事情可以看出来。

还有另外一点，钱先生不喜欢交际应酬。他不是不愿意跟人家来往，而是他的精神集中在学术研究，在馆务方面。他很少晚上出去跟人家应酬的，除非是外面有客人来，他不得不代表图书馆请客。他生活非常有规律，每天中午十二点一定回家跟钱师母一起吃饭，吃完饭后一定睡一个小时，然后又回来馆里面工作，或者在家里做他的研究。所以对图书馆界这方面的是是非非，他可能了解得不是很清楚，也没兴趣，他根本没时间去理那种事情。很多消息他是从我们这些后辈这里听来的，听了以后他也不表态，也不说好也不说不好。

钱先生还有一个特点，他很少夸奖你，你写东西写得怎么样好、工作得怎么样好，他只是点个头说：“嗯，还不错。”这就是很好的了。他很少说你这个人很了不起怎么怎么样。他要求蛮高。他要你改，他从来不说“你不行，那个什么怎么样”，只是会暗示给你听，你就会知道他不满意了。他也很少直接地批评人家，他只是用暗示，就是说你这里做的还不够，应该是这样子做。我认为这种教导也是蛮好的。

记得我那个时候住得离他家大概两个 block，就是隔两条马路，很多时候晚上十点、十一点收到他的电话：“哎，这种东西还需要改一改，你明天七点钟上班之前，绕个路到我家来拿那个东西去吧。”这样已经是很习惯了。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不高兴，已经十点多十一点了，还摇电话来说什么。但是以后几十年做行政业务，就慢慢想起来，这种教导是蛮不错的。

那几十年，我跟着钱先生，我做过他的学生，也做过他的助理。做他助理的时候，的确是一种打杂的那种助理，什么都做，展览也做，修改文章也做，打字也做，找资料也做。但是我认为，这种教育我一辈子受益不浅。就是那种教育，我前面讲到，他完全不满意，要求很高，让你两改三改这样来做。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就说：“到什么时候你才满意？”但是这几十年离开了他在外面工作的时候，慢慢地也养成了这样的习惯。

他生活有规律。他可以活到一百零五岁，可能跟体质有关系，但是可能跟生活很有规律也有直接的关系。他跟我说，他习惯了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如果哪一天不能工作十二个小时，他就感觉到好像缺了什么东西一样。这样子连续干几十年的活，这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成就。

他一辈子都认为他是北京图书馆的人，他这个理念完全没有改变：他是从北京图书馆出去的，他一辈子也是北图的人。我们现在都习惯了，把国家图书馆叫北图。当然他对北图最大的贡献，就是抗战的时候把一些善本运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去保存。因为政治的关系，这批东西就回到台湾国民政府“中央图书馆”，现在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他认为这批东西是北平图书馆的财产，是国家图书馆的财产。他曾经跟我说过，他最后的一个心愿就是希望这一批善本回归到国家图书馆来，他没有别的心愿了。

有一年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开国际图联大会，那一年我去了。他就特别写寄了一些传单，就让我带了一大堆这种传单，帮他在会场上分发过去。到了宋楚瑜——刚才周馆长说过，这也是他的学生——做到台湾省省长，要选国民党主席的时候，他也跟我讲过：“哎，可能有希望啊，宋楚瑜可能做国民党的主席。”到连战做国民党主席的时候他又跟我讲，他就说：“希望还是有的。”连战是芝加哥大学邹谠的学生，也算是钱先生的一个学生。他这一辈子念念不忘的，就是现在存在台湾的故宫博物院的那批善本，是应该送回来到北京图书馆，就是现在的国家图书馆。这是他没办法了的一个心愿。

但是我个人的看法跟老先生有一点不一样。这批东西我同意是北图的财产，但是台湾总归是中国的一部分，总归有一天台湾会回到中国来的。所以我也跟钱先生说：“你不用急，等嘛，时间是最好的，暂时放在台湾那边，到台湾回到中国来以后，也就等于回到北图了。”这是我跟他老人家看法有一点不大相同的地方。他就是说：“如果没看到这批东西回到北图去，我死不瞑目。”所以他跟我说连战有机会，宋楚瑜有机会，我就说：“政治方面不是那么简单的事，看机会吧。”但是我个人相信，台湾总归有一天会回到中国来的，回到中国来了，这批善本就自然会回到国家图书馆。这是不容否认的事。

最后讲一讲他怎么样工作。他的目标很高，他永远不会停止，事情遇到困难办不妥，他永远不会放弃。这是他的特点。我希望我也在这方面学到了一点东西，我认为做人就应该目标很高。我非常同意他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小图书馆员，我现在也是一个图书馆员，但是我也不自卑，因为这是我自己选择的一个工作。眼睛要放得远，目标要放得高，遇到什么困难不要轻易地放弃，用不同的法子达到那个目标，完了这个目标还有另外一个目标，这样子一个人的生命、一个人的事业

才会发展下去，一个图书馆才会发展下去。

这是我跟从钱先生几十年的几点小的理解。

林世田（中国国家图书馆展览部主任）：

我非常有幸，在 2010 年的时候专门去美国芝加哥采访过钱老。当时钱老正好是一百华诞，国家图书馆也刚过了一百华诞，要做善本南迁的专题片，我和田苗根据馆里的安排，在 2010 年国庆节期间去的。在这之前，作为国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我自己在看书史、印刷史，特别是馆史的时候，对钱先生有一点模糊的印象。接到任务以后，因为要对他做一个采访，就把钱老所有的论著，郑炯文馆长和其他学者的介绍，做了认认真真的学习和梳理，对钱老的印象也从模糊到清晰。特别是到了芝加哥见到钱老以后，我们更感到特别的亲切，就像郑馆长说的，真的就是国图人，见了国图人，确实是一家人。

尽管钱老当时已经一百岁，但是精力、状况特别好。我跟周原馆长整整用了两个多小时采访。采访结束后，周原馆长也是继承了钱老的风范，请我和田苗在旁边的一个中餐馆吃饭——不光郑馆长继承了，周原馆长也继承了钱老的风范。当时看到钱老饭量很好，身体很健康。当然周原馆长肯定也隔三差五的跟钱老一起吃饭，所以对他的饮食要求了如指掌，点的东西都是钱老爱吃的，所以那天老先生胃口非常好，至始至终非常高兴。最后送他回公寓，圆满地完成了采访任务。

今天我们国家图书馆在志清馆长的倡导下举办纪念钱老的展览，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大家知道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全国各地都要办一系列的展览，像国博、抗日战争纪念馆，还有全国各地的很多地方。国图也要办展览。国图办展览是怎样的原则呢？最后定的主题是文化抗战，国图是一个文化单位，所以就从文化抗战的角度举办展览，特别是把国家图书馆在文化抗战中的作用给梳理出来，向社会展现。其中最重要的，就有钱存训老先生。

说到钱存训先生，必然说到善本南迁。抗战前，国图把 2720 多种特别珍贵的善本书南迁上海，这些善本书在包括有从内阁大库继承下来的国之重宝。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上海也处境危险，钱老真是冒着生命危险，用两个月的时间，自己用手推车把 100 箱古籍运出海关。当然我们现在和平时期可能觉得没有什么，但是当时是在战争时期，尤其是日本占领时期。日本这个民族的两面性特别明显，在战争时期就是一个魔鬼。我觉得李光耀总理写得特别好，昨天还杀人如麻，第

二天投降之后，把新加坡的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彬彬有礼地退出了新加坡。在当时的上海，确实也是杀人如麻。钱存训先生在特别恐怖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把 100 箱善本书运到美国，把这些珍贵古籍保存下来，免遭战争的毁坏。

抗战时期，国家图书馆还做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工作，就是抗日战争史料的征集。我们今天在办抗战展的时候，很多很多的抗战资料都是当时征集的。抗战时期，平馆在北平留下王访渔、张允亮、顾子刚，这些人组成馆务委员会，维护馆产，避免日本占领时期毁坏丢失。因为北平当时也是非常混乱的，留守的馆员为了维护安全也做出了很多努力。当然还有一些很有气节的学者，像孙楷第先生，1941 年日本派了宪兵在图书馆的门口站岗放哨，孙楷第先生气愤之下就离职了。他看不惯日本人占领图书馆，他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办法工作，所以他到了中法汉学研究所给人家去做讲座、写文章为生，很有民族气节。当然，国家图书馆也损失了这么一位优秀的学者继续在馆服务。还有一部分馆员是在袁同礼的带领下到了昆明，与西南联合大学一起，大家共同建立图书馆，为这些学生、老师服务，继续履行国家图书馆传承文明、服务社会的宗旨。

另外，袁同礼馆长高瞻远瞩，觉得抗战肯定是要胜利的，这段历史一定要保存下来，因为国家图书馆的任务就是要存史。所以到了昆明的时候，他让各个地方的办事处都征集抗战资料。钱老当时担任上海办事处的主任，他一方面是守护国宝，第二方面征集抗战史料。像日本在上海出版的一些报刊，像地下党在上海出的出版物、国民党在上海出的出版物、日伪出版物，他能收到的都尽力收到。今天我们对这段历史认识得这么清晰，得益于袁同礼馆长在昆明收集抗战资料，得益于钱老在上海收集抗战资料，使国家图书馆的抗战历史资料非常的丰富。我们在认真地梳理这段历史的时候，非常地感念我们的前辈，我们的袁同礼馆长、我们的钱老。

说到运美善本，到了袁同礼馆长 1965 年在美国去世以后，这批书失去了监护者。袁同礼馆长到美国国会图书馆，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看护这些书。到了 1965 年他去世以后，这批书没有监护者了。当时我们和美国还没有建交，美国就将这批书运到了台湾。到了台湾以后，台湾地区学者对它进行了研究和编目。在研究和编目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觉得在 102 箱 2720 多种善本书里，为什么有些是残书，有些书在国图是有完整的，但完整的书没有运到美

国，而为什么仅存一册、两册的残书却运到了美国？于是写文章质疑，他们认为参与善本南迁的这些人中，有人从中做了手脚，假公济私，把好的书自己留下来了，而把自己收藏的不好的书滥竽充数。这样我跟刘波梳理我们的档案，一百箱善本书的装箱记录，还有很多其他相关档案，我们彻底明白了：第一，我们刚开始要运到美国的善本书就是一百箱，那些书都是特别好的。第二，之前国家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要合办展览，合办展览就要提供展品，当时选择了一些比较普通的版本，比如一些残存一册、两册的书，在 1938 年、1939 年左右把展览用书装在两个小箱子里，寄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后来和运美寄存的书合到一起了。这就是从一百箱到一百零二箱的缘由。我们这项研究，就是要给参与善本南迁工作的人，特别是像钱老，像王重民先生，像徐森玉先生，要给他们一个交代，因为他们确实是为民族文化遗产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它，我们不应该对他们有任何的指责。这篇文章发表在我馆的《文献》杂志，也是我们对参与善本南迁的袁同礼馆长、王重民先生还有钱老的一个纪念。

志清馆长给我一个命题，讲讲国图精神。刚才郑馆长说了，钱老一直把自己当成北图的人。尽管远隔万里，但是他一直心系国图。不但心系寄存在台北的这批书，也源源不断地向国图赠送资料，比如韩国发现了早期的印本，他就把这些资料提供给国图。我觉得，我们国家图书馆经过百年的风雨，有无数的丰碑，像梁启超馆长、袁同礼馆长、王重民先生、向达先生、钱存训先生，这些都是国图的丰碑，是这些人让国图精神更加丰厚了。在国图百年诞辰的时候，李致忠先生领衔把《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编出来了，其中提炼出四个精神。第一是不遗余力的采访精神。采访精神在钱老身上也有体现，抗战时期钱老不但征集抗战资料，也买社会上流散的古籍。第二个是恪尽职守的守护精神。钱老从 1937 年到办事处一直到去世，他对这批书一直没有放弃守护。刚才郑馆长、志清馆长说到他对这批书一直念念不忘，这就是守护精神。第三个是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钱老把一生奉献给图书馆，奉献给学术事业，使我们的书史、印刷史研究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我们馆有两棵不老树，一个是张秀民先生，一个是钱存训先生，他们都为中国的印刷史研究作出了卓越的研究，值得我们国图的年轻人怀念和继承。第四个是爱岗敬业的道德精神，钱老不但在国图的十年为国图奉献，后面还不断地捐赠他的手稿、藏书，他确实念念不忘国图。我觉得图书馆员的道德精神在他

的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韩永进馆长到了国家图书馆以后，对国图精神又加以提升，就是与国家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爱国精神。在善本南迁等一系列的事情上，我们都充分地感觉到了钱老的爱国精神。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展览非常好，非常有意义，我相信我们馆领导也会不断地请我们的年轻员工，请我们的党员、团员来参观展览，来学习钱老的精神，来发扬国图精神。

